

生命蕴涵的诗意掘进

——析里程小说《穿旗袍的姨妈》的儿童视角叙述

李江梅 崔梅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透视叙事情境中的人、事、物，视角不同，其视见也各不相同。这就是视角自身的设定性，可称为个性化视角。它表达的是承担视角的人物的独特体验，流露视角人物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等。在众多的个性化视角中，儿童视角（从儿童的角度观察故事）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颇受小说叙述青睐的独特视角。里程《穿旗袍的姨妈》正是以儿童视角诗性过滤生活的一个作品。以儿童的视角打量生活，生活会散发出新鲜、诗意的氤氲，那些在成人视角中悲苦沉重的生活状态，在儿童视角的观照中，都脱离了“习惯化理解的轨道”，被诗意地呈现了。

《穿旗袍的姨妈》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历史故事。小说从小男孩骆驼（“我”）对二姨妈的追忆开始，以儿童的视角巧妙、灵活地拼接出了“文革”的历史，书写了骆驼在“文革”中从童年到少年的身体与心灵成长的碎片。故事用儿童视角叙述，是用一种纯真、稚拙、欢愉、朴素的美的眼光看见悲苦生活中儿童感兴趣的和儿童的生命性原则选择到的东西，即对生活进行诗性的过滤。这种儿童视角对生活的诗性过滤，主要体现在感性直观的把握世界、人性化的判断生活、善于发现细微之美和心灵的自由释放等方面，这些最具诗性的审美视角与成人视角有着最大的差别。

一 感性直观的把握世界

遵循成人世界的逻辑为基础而形成的成人视角，是一种理性的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而儿童视角对生活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直观的把握。“所谓‘感性直观性’，是指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器官而非绕道理性思维，直接而非间接地与对象打交道，而对象也是以自己的感性外观（即感官可以把握、感觉的外显形式）而非内在本质，直接而非间接地呈现给主体，从而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感性直观的关系，即审美关系。”^①在儿童视角中，感性直观的审美尤为突出。儿童对自然、生活中的事物往往会作出本能的反应，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并努力地去捕捉对那些混沌、复杂的事物的感性外观的直觉感

受。这种感性直观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往往将难言、丰富、隐秘的生活和生命内涵简洁、直观地表现出来。

儿童视角的“看”这一视觉行为（包括延伸出的“听”、“想”等理解行为）主要处在认识的感性阶段，但是，“在认识的感性阶段，人虽然还没有理解事物的本质规律，但客观事物给人的利害，却造成了人的情感倾向性。”^②而“情感活动与人的感觉一样，都是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属人的本质的。”^③所以，儿童视角感性直观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虽是认识的感性阶段，也能掘进到生活和生命的深层意蕴。

《穿旗袍的姨妈》中，二姨妈那聚敛了大量财宝、秘不示人的红楼房对“骆驼”这个孩子的诱惑及给他带来的巨大快乐，是来自于红楼房中那些目不暇接的各有趣味的稀奇之物的感性刺激，“我”（骆驼）觉得它们“诡谲而迷人”，所以“我”感到快乐。这是由于“感性经验同时整和着欲望，将功利性占有的快感转变为非功利性拥有的审美愉悦”。^④二姨妈在“我”吃完她买给“我”的热乎乎的红薯后问“我”：“你母亲好，还是姨妈好”时，“我”毫不思考地说“姨妈好”、“她不来接我，就是不好。”非常感性、单纯的心理认知把儿童对复杂的人和事的判断简单地表现出来。

儿童成长中对复杂的人和事的认知，在儿童视角叙述中更多的是以混沌、直观的方式表现的。如二姨妈家那独有的“我”从小就非常爱吃的疙瘩汤，曾经让幼小的“我”得到最大的享受和满足，但后来“慢慢地，我觉得二姨妈做的面疙瘩不如以前好吃了”，为什么？“我”作为孩童，肯定是难以理性地分析出自己心理成长发生的变化改变着自己对人和事的认知判断的，所以只是直观地感到“不如以前好吃了”。这种“不说之说”包孕了极丰富的意义；当一场急风暴雨的“文革”降临时，幼稚懵懂的“我”虽然不知道它是非对错，最初还把北京来的学生砸烂政府机关当热闹看，但是“我”幼小的心灵敏锐地感觉到城市隐隐约约的骚乱声中有“一种不安稳”、“这座城市疯了”、“外面的世界不安全”，同时“我”发现“内部的世界也不可靠”，因为家庭的纷争几乎与“文革”同步，“我”分明感到了“恐惧感从暗夜四周向我袭来”；还有大姐无奈的婚姻、二姐的精神分裂，这一

切复杂的人和事都是以裹挟的状态,混沌、感性、直观地在“我”的眼中和心中呈现。

至于那神秘、羞于启齿也尚处于无意识心理层面的少年的性冲动,更是依靠感性直觉的方式才得以逼真地传达。在避难躲到“袋鼠”家阁楼上那段难熬的日子里,“说来奇怪,那时候我最想念的不是母亲、姐和二姨妈,甚至还有一些解脱的自在感”,最想念的是让童年的“我”初觉异性之美的“桔子”和与初觉性冲动的“兔子”,这种莫名的思念就是一个儿童最隐秘的性心理的感性直观的袒露。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来看,这里深蕴着最深层的儿童心理的复杂内涵。这种深层内涵就是在“不说之说”的感性直观的把握方式中最简洁也最真实的得以显现,也就是说,“感性经验本身就似乎对人诉说着什么,它自身就有了意义,它自身就展示自身而成为形式。当然,此时的‘意义’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蕴涵其中的,所以可称‘意味’”^⑤,这正如鲍姆加登所揭示的那样,感性经验不需要转化就让人感到富有意味。

二 以纯真的儿童人性判断事物

在广袤而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前,儿童心灵世界总是显得稚嫩、纯真、美好。这种儿童生命固有的品性,成为儿童视角叙述的诗性特征的客观来源。儿童因未受到成人世界的习俗、偏见、虚伪等的干扰和污染,他们在对周围的人、事、物进行判断时,充满着纯粹的热情以及童年的坦率和公正,这使他们摆脱了成人世界的利益驱动和复杂性,有可能对世界作出更人性化的判断。当二姨妈把“我”带到她那挤满了成人眼中最有价值的财宝的红楼房时,“我”兴奋、激动,不是因为那一屋子东西的“物质价值”刺激了“我”,而是因为它分明是“童话世界里的宫殿”,因为它的丰富奇异给“我”创造的奇迹。“我”陶醉在这个对儿童来说最能满足其好奇心、极能满足儿童游戏天性的、可以给“我”带来视觉和精神愉悦的奇迹中,“我”对红楼房的价值判断,是因为它满足了“我”这个孩子的人性,换言之,“我”是以纯真的儿童的人性为标准判断着红楼房的价值,而不是以物质价值的标准决定“我”对红楼房的兴趣。“我”对红楼房的兴趣,是一个儿童对丰富的客体世界带来的好奇心的满足、视觉和精神愉悦的满足以及儿童游戏特性的可能满足决定的。

儿童视角叙述有时也和成人视角叙述有交叉,但成人视角荫蔽在儿童视角叙述之下,所以叙述也交织着成人世界复杂而诡诈的事物,但它往往被纯真的儿童视角揭开,作出更人性的判断。当“我”目睹二姨妈一生节俭聚物敛财,以及亲戚们在分配二姨妈遗产时绞尽脑汁、用尽计谋,不惜牺牲亲情争夺利益的种种可悲行为,“我”感叹:“二姨妈死后从她床底下翻出的大量碎砖块,三姨妈踮着小脚长途跋涉的苍老身影,以及四姨妈八十岁生日那天的庄重场景,以及舅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惜毁坏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声誉和形象,而多少年后他的妻室儿女弃他而去,让他一个人游荡于乡间的阡陌小路,过一种孤魂飘零的生活,这些重合交错的景象,都让我真切地感到,汨汨流淌在我血管里的

血液源头来自何方。”这段叙述以儿童那不受世俗利益羁绊的纯净眼光看着为利而喧嚣的成人,悲叹的是血缘亲情的可贵和成人对此的不珍视。在一个儿童的眼中,“流淌在我的血管里的血液源头”比二姨妈那包括房产在内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遗产的分量沉重太多,“我”作为从小与二姨妈建立了感情、历来受二姨妈偏爱的晚辈(虽然后来抗拒做他的儿子,特别是在被“她是地主婆”这个魔鬼般的念头缠住之后执拗地拒绝),似乎更有理由在遗产争夺中多操胜算,但“我”在二姨妈去世后,只感到“无边无际的孤独和恐惧”,对亲人的离去“我”体验的是“死亡”对心灵的创痛,追悔对二姨妈的态度不合适,本真地体验着靠近死亡的心灵感受:“一个原先你很熟悉、离你很近的人突然消失了,它使你想死,其实离你很近。一个熟悉的人死去,就像距你不远处的地方出现的严重泥土塌方,你脚下的土地仿佛也开始晃动起来。”这种对生命消失的感受,是在没有物欲的纯净童心中最人性的价值判断。面对死亡,儿童视角发掘的是生命和亲情的价值,传递着深刻的人类生命的内容和信息。这是没有世俗功利束缚的对世界的人性化的判断。遗产争夺挑战血缘亲情的地位,“使我从感情加速背离家庭的走向”,表现出一个孩子以纯真童心对人性内涵的选择。

客观世界是一个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物理世界,成年人是按照理性、实用的思维模式与生存本领来认识这个世界的,而儿童则是以生命性、人性的思维模式与生存本领来认识世界的。所以,用儿童的视角看世界,一切都是生命的对象化。“骆驼”看见“一枝野百合从深沟里探出头来,洁白的花朵上停留着一只蜜蜂,黄黄的身躯随风摇曳,划动金灿灿眩目的光环”,这野百合、小蜜蜂都禀赋着人的灵性,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儿童思维的这种生命性原则,使一切事物都具备人性特征,所以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从物理、功用性的角度来认识,而是纯然撇去物性的人性化的判断。

面对一场儿童无法理解和认识的“文革”灾难,“对一个心理处于封闭状态的男孩来说,并无直接实在的意义,真正困扰、折磨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对母亲的善恶评判”。即“我”的评判只着眼于人性的善恶而非政治性、社会性的是非。作为被判刑并死在监狱的犯人的妻子的母亲,作为会粗俗下流的辱骂的“地主婆”的二姨妈,还有那个颇善于治理孩子的“老太太”老师,“我”对她们的认识与判断,都不是以关注历史的扑朔迷离、是非曲直为重心,而是以儿童视角对生命本身的敏感“向内”探寻着历史的人性内涵,是“非历史”地感受生活,即人性地判断人和事。

在这场残酷的摧毁人性之善的“政治运动”中,“我”一个没有能力看清这个世界、又没有精力完全介入现实生活的孩子,只能蜷缩于“我”能理解的小小天地:“我”高兴地参加舞动红樱枪的舞蹈,因为这是那个时代满足儿童游戏天性和人性愉悦需求的最合理的方式;“我”不懂政治的意义,“我”只是从人的生存安危的感性体验中知道“这个世界彻底丧失了安全感”、整天让“我”过担惊受怕的日子。所以,“我”从这种童心感到的恐惧中逃离,让幼稚的童心、纯洁的人性逃离到避开政治风暴的懵懂性爱中、童年友谊

中,逃离到寻觅血缘的族脉、亲情的人伦缓冲地带,从而发掘了历史、政治、灾难背景下的人伦缓冲地带的多向性和复杂性(如二姨妈的美与丑、善良与可悲;三姨妈的柔善与贪婪;舅舅的慈爱与自私;“老太太”老师的责任心与圆滑……)。

三 心灵的自由释放

与儿童思维的生命性原则相应,儿童感知、认识、价值判断的取向,还依循单纯、真实、公正、坦率的心灵自由原则。康德认为,“自由”就是人的意志的自我肯定,这种肯定就是人的生理性的闪光,它本身就是善,就是最高的义务,代表着人性的普遍性。黑格尔也说“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由于儿童缺乏对外部规范(成人世界的逻辑和规则)的认识,所以其很少受这些规范的束缚。他们不懂或很少懂得社会的清规戒律,心灵有着很大的自由性,这就有可能使他们以稚拙、纯朴的童年生命气象呈现最自然、本真的生命感觉和意趣,单纯、真实、自由地体验生命的深层内涵,从而传递出某些深刻而隐秘的关于人类生命、文化的内容和消息。

《穿旗袍的姨妈》中,对成人世界的物质利益争夺、政治斗争哲学不能理解的“我”,避开了亲戚争夺遗产和政治斗争的喧嚣,真真地品味着亲人离世给自己的心灵留下的不可填补的空隙,感性地体验死与生的生命意义(虽然是儿童幼稚、直觉的感受,但却是本真、深刻的);用最单纯、质朴的情感体验着死亡带来的心灵之痛,发掘出那些曾经在“我”的眼中“具有高大巍峨的形象”、“给我温馨关怀”的舅舅姨妈们美好人性后的贪婪、自私、狡诈;“我”感受到了二姨妈对我的呵护关爱,也发现着二姨妈的粗鄙、守财;即使是母亲,我也在做善恶的评判。“我”的心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的束缚,自由地行使真纯认知的权利。

一场“文革”政治灾难使“我”的家庭遭受了苦难,但那一场让我“舞动红缨枪”的舞蹈,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拉练”,却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力勃发带来的痛快、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喜悦,以及儿童游戏天性得以释放的快感,这一切与儿童心理需求和儿童天性吻合的活动,都使得“我”因“政治灾难”带来的心理焦虑、自卑感被冲淡。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本我的重要功能——寻求欢乐和躲避痛苦,即本我遵循的快乐原则。为着躲避现实的痛苦,“我”躲在阁楼上读《老水牛爷爷》,为“老水牛爷爷被水冲走后,那条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狗不吃不喝而饿死”而整整难过了一个晚上,现实的苦难再沉重也压抑不了儿童情感的自由释放。而“我”的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发涌动,也不因“政治灾难”带来的痛苦而萎缩,即使躲在阁楼里避难,“我”对“桔子”和“兔子”这两个与“我”的性觉醒有关的人的思念,也压抑不住地从无意识性心理的低层突破出来。这是人的潜藏的强悍的本能与欲望(本我的内质)的质朴外现。本我(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完全隐没在无意识之中,它主要由性的冲动构成)的自由宣泄与挥洒即是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自然流露。

可见,儿童是以自由的心灵来观照世界的,它发散着儿

童的坦率和公正、快乐和自由、本能与欲望。在心灵的自由遨游中,儿童对人、事、物的感受和认知,完全是无所顾忌的。以儿童视角审视世界,其洞见的是未经过“人化”和“文化”修饰、改造、遮掩的人的自然本性、生存之真(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生存)。儿童视角可以看见被社会的规范束缚太多的成人看不见或不愿正视的东西,在心灵自由的释放中寻找着人性的生活的本真,从而将人心之外的现实带来的苦难滤除或淡化,儿童心灵的自由选择成为文本最重要的出场者,政治运动的严酷、生活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四 敏于发现细微之美

以成人视角观照事物,因其理性的解释会使得一切奇异都暗淡无光,很难见出司空见惯的普通生活、事件的细微之美。但以儿童视角观照事物,孩子的感知可以激活一切,使我们有可能透过他的眼睛发现世界的细微之美。儿童眼光的本真性、敏锐性、奇异性,可以将最寻常的事物用美的眼光过滤出来,透露出独具美感的生命形态。儿童视角叙述,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在感知轴上的细微敏锐,将生活细节化、诗化。所以,幼儿园里的“我”看见“阿姨坐在小桌上打毛衣。墙上的挂钟滴答走个不停。斜阳照在窗台上,一只小虫子缓缓爬上彩色玻璃,它越爬越高,碰到窗台后噗地掉下,小虫子稳稳身子,又开始艰难地向上移动……”这些生活中最细小的、最易被成人视而不见的环节,在儿童眼中却展现出生活和生命的细致之美。这些事物具体、真切、独特,形象的外在形态构成了形式美的感性材料,使真与善的情感内容得以具象化、个性化和成为感性的形式。美就存在于这样的感性形式中,美的本质就存在于合规律(真)与合目的(善)的感性形式中。再比如,第一次拉练到郊外“我”看见的那些宛如荡漾水田的绿色原野,软绵绵走上去很舒服的田埂,深沟里探出头来的一枝野百合,洁白花朵上的一只黄黄身躯的蜜蜂;还有二姨妈的发髻、雪白雪白像藕一样的手臂、悬浮的遮阳伞、旗袍衬出的婷婷身材、白色高跟鞋,以及表姐们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清脆高亢、悦耳的乡音;那个身穿套装体态丰腴袅袅而行的老师;“一只红冠公鸡追赶一只雏鸡从我脚下跑过”……这些些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被放大、凸显,发现了常态视角无法看见的生活之真的感性形态,使无邪单纯的童心产生了悸动和愉悦。由此可见,这些细微之美不是以对象的内容可以满足人的肉体需要并使人产生生理的愉快为特征的,相反,它主要是以对象的形式能引起人的精神愉快为前提的。所以,这些细微的形式不是无内容的形式,而是因其表现了生活之“真”与生命之“善”而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儿童视角发现生活的细微之美,是以前所未见的细节性感性形式为材料的,但它发现的美又不止在形式,即这种细微之美在形式而又超越于形式。

儿童的幼稚与单纯,这是儿童视角敏于发现细微之美的内在心理因素。儿童认识世界首先注重形式的初始性特点,也是儿童善于关注、留意细微形式之美的认知特点。所以,不用刻意驱动和激发自己的情感,生活中最不为人留意

女性视野下的董立勃小说批判

成湘丽

作为一名勤奋而坦诚的新疆作家,董立勃在遭遇了写作的“瓶颈”(见《当代》编辑周昌义为《米香》发表所做的注脚)三年后,仍然笔耕不辍地活跃在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中。他固然可以用不是大师,是作家都有局限来为自己做出无奈而真实的解释,但读者不会放弃对他更高一些的期望,尤其是在新疆生活的文学研究者,自然更会期待他的下一次突围和转变。

对于他所遭遇的困境,大家提到的比较泛泛的观点是,董立勃在《白豆》之后的小说创作中不断自我重复,包括非冲突式的人物设置、男性争夺女性的故事模式、戏剧化的情节突转、从权力下逃匿的主题倾向、不断失踪的结尾坐标甚至包括古龙式的简洁对白、趋于通俗的审美趣味等等。但如果我们细细比较这些发生在“下野地”的浪漫往事,或许会发现趋于单调和重复的文本后,是一位并不苦恼甚至很自信的叙述人,他已经沉迷在某一种似乎可以带来一些快感的氛围中乐此不疲。

的小事小节,都能让童心享受融融的暖意和愉悦。和二姨妈一起吃着热乎乎的红薯,一边俯看灯火点点的河面,“我”觉得“那是吃得最香的一顿晚餐”;那个穿套装体态丰腴的老师接“我”去上学,“牵着我的小手,并捏得很紧,很用力,使我在面对恐惧的目光时仿佛找到了保护神”,生活中细微的温暖和爱的感受,是如此地陶醉了一颗童心,或者说,是儿童视角滤去了生活之重发现了细微之美,使得生活中那些被成人忽视、被灾难压抑的真、善、美放大、弥漫开来,从而驱散或淡化了苦难。凡此种种细微发现,都会让人感受到阴郁沉重下的缕缕光明,以童心的敏锐放大这点点光明,政治运动的严酷、生活的苦难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由上观之,儿童视角作为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以儿童澄澈的、更具人性化的眼光直觉生活、细化生活,以儿童天性的单纯、质朴、真实颠覆了成人世界的逻辑,以心灵的自由释放避开社会、政治的喧嚣退回到内心寻找生命的

一 可“吃”可“看”的“粮食”

对于模式化的女主人公名字,作家有一个很有意味的解释。他坦言“不错,我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全是女人,我还喜欢给女人起些和农作物相关的名字。我想,女人,也是粮食。没有女人,这个世界,不知会有多么饥荒。正是有了女人的喂养,我们才得以成长。于是,豆啊,麦啊,还有谷子啊,穗子啊,全成了我小说中女人的名字。”^①

可也许,我们会同时心生一个新的疑问:那么这些女性的“姓”呢?如果以传统对女性的“姓”本来是个空洞的能指、游移在女性依附的男性的“姓”中无法自我完成作为解释还显牵强,那么,“女人是粮食”这个判断本身在董立勃的小说中就至少体现了两重含义:主动的滋养和被动的占有。这个因为女性而不再饥荒的世界,在小说中也明确地只指向男性。

我们看董立勃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白豆》、《米香》,题目本身是富有诱惑和吸引力的,再加上作者不断在

本真,窥见生命的深层内涵,从而使“生活”被纳入到“生命”的语境中予以阐释。人的感性直观性、人性、心灵自由性、发现性等生命特质,在生活中以一种儿童的稚拙认知和感受显现出来,这实际上表达的是“生活”向“生命”的追回。在儿童视角中,“生活”的社会、历史因素被大大滤除,关于人物和行为的社会及现实的理性判断、价值判断也渐渐隐退,而生命的深层意味则在“生活”的画幅上得以色彩鲜明地凸显。

注释:

①④⑤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43页,第61页,第61页。

②③陈进波、惠尚学:《文艺心理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